

ABOUT  
THE  
AUTHOR



**徐兆壽** / 男 (1968-)

甘肅涼州人，作家，學者。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國家級高層次人才，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北師範大學中外寫作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甘肅省文聯副主席，甘肅省電影家協會主席，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著有《荒原問道》《鳩摩羅什》《非常日記》《西行悟道》等 40 餘本著作。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藝術基金項目等 10 多項。

**陶炳塬** / 女 (1994-)

甘肅蘭州人，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戲劇與影視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西北戲劇。

# 徐兆壽：新西部、新探索與數次寫作轉向

陶炳堦 徐兆壽

**摘要：**徐兆壽在訪談中分享了他對於西部文化的深刻見解及其個人書寫轉向。他認為，西部不應僅被視作貧窮與落後的象徵，而是一個擁有豐富歷史與文化自信的地區。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西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徐兆壽強調，中國的文化自信源於對漢唐盛世的回顧，而西部正是這一文化自信生發的源泉。他提倡重新發現西部，打破中原文明中心論，通過寫作與研究，探索西部在中國文化及全球文明交流中的獨特地位。徐兆壽的寫作轉向經歷了從詩歌到小說，再到深入研究《易經》和中華文明觀的過程，其作品反映了對西部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認識與探索。

**關鍵字：**西部文化 一帶一路 文化自信 寫作轉向 易經研究 中華文明觀

## **Xu Zhaoshou: New West China, His Novel Exploration, and Personal Writing Transformations**

**Tao Bingyuan Xu Zhaoshou**

**Abstract:** In the interview, Xu Zhaoshou shares hi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culture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his writing transformations. He believes that the wes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merely as a symbol of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 but as a region rich in histor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With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role of the western reg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Xu emphasizes that China's confidence stems from reviewing the glory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admittedly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source of this historical confidence. He advocates rediscovering the west, breaking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centrism, and reinforcing the vital position of the wes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 writing and research. Xu Zhaoshou's writing has evolved from poetry to novels, and then to in-depth studies of the Yijing and the Chinese view of civilization, with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thought of China's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spectively.

**Key words:** western of China region cultur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confidence; writing transformation; Yijing studies; Chinese view of civilization

## 一、重新發現西部和故鄉

**陶炳堦：**徐老師，我們收集作家學者關於西部表達的“外來者視角”的評判，並集結為一本西部文化訪談錄，請問當初做這件事的契機是什麼？為什麼要孜孜不倦地向外尋求答案？

**徐兆壽：**來源於我的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就是傳播西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西部給外面的人的印象，特別是西安以西，尤其是甘肅和新疆。我們就是給人一種大漠、戈壁和雪山這些地貌印象，之後的感受就是貧窮、落後和封閉。就是這些原始性的東西。過去張賢亮、邵振國、楊顯惠、張承志、馬步升、劉亮程、雪漠等作家，包括陝西的一些作家，都寫的是這樣一些存在。張賢亮是“出賣荒涼”，路遙、賈平凹寫的則是貧窮與傳統。陝西作家與其他西北的作家還又不一樣，陝西更接近傳統，屬於典型的中原文明，而西北的其他作家則顯示出更為複雜的一些文化存在。但是，我認為這是前西部，或者說是過去的西部。

**陶炳堦：**何為前西部呢？

**徐兆壽：**過去的西部是後方，整個國家建設的後方，前沿是東南沿海地區，西北就是後方。長期在後方就形成了這麼一種落後的封閉的保守的思想，我們亟需去變革，再加上我們確實本身在歷史上也處於這種劣勢。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覺得過去的認識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是很誠實的寫作。可是當一帶一路這樣一個國家倡議出現後，我們對西部的認識就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就我自己來講，我覺得西北的絲綢之路不再是封閉、落後的這樣一個存在。在絲綢之路上那麼多浩浩蕩蕩的歷史，那麼多漢唐時代的偉大故事，它會是封閉落後等等這些概念所能取代的嗎？當然不是。

這跟國家的發展有關係，過去我們是向西方學習，中國傳統的思想與資源都被遮蔽了，但是當我們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以後，我們的文化就甦醒了，所以我們要建立文化自信。中國的文化自信在哪里？我們經常在提及漢朝、唐朝的時候，你不就已經開始往西看了嗎？這就是中國的文化自信。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這樣一系列的看法也跟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

**陶炳堦：**那從您本身出發，如何來理解這種“前西部”的狀態？

**徐兆壽：**我的看法可能要更早一點，是我在上海求學的時候的覺醒。我到上海去似乎人人都不太理解我們的西部。一個博士生問我，蘭州有電嗎？我就在想他為什麼會有如此“愚昧”的認識，這個時代哪個地方會沒電呢？尤其一個省會城市。但是他想都沒想就問出來，說明什麼呢？我們西部給外界的人傳播的是這樣一種信號。那時候，我正住在復旦博士宿舍裏寫《荒原問道》，有時候醒來，我的內心往西一看，竟然看不見人，看見的全是黃沙、戈壁、高山。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我就是這樣。所以我當時一看西部沒人，只有這些東西，我就理解東部的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認識，我就理解他們了。

第二個我理解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在上海時發現，那里的學者對南方作家很熟悉，對北方作家較為陌生，你就會發現人們的閱讀其實是有局限的，或者說有中心。有次在杭州開會，大家都談論中國文學如何走向世界。我當時就在想，難道我們中國文學不在世界上嗎？我們中國不在世界上嗎？走向世界走向哪里？不就是歐美嗎？其實我們談論的問題是我們的文學如何傳播，讓歐美人認識、承認我們，是不是這個道理？當時，我的心中有了另外一個強烈的念頭，即如果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那西部文學是重頭戲，那麼西部文學又如何走向世界？可是，當他們在談論中國文學時，有西部文學這個概念嗎？我記得以前有陝軍東征，為什麼要東征？說明東部是中心。在上海你就會覺得中國太大了，西部太偏了。所以，我當時就發現，我們當時說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是因為我們把中心定在了歐美，就跟我們的文化歷史各個方面一樣，我們都把尺度交給了歐美。這與唐時一樣，中國在那時就是世界的尺度。“歐美中心主義”這個概念就是在那時橫亙在我的前面的。也許上海人就不會這樣的問題，但對於我這個西部的作家和學者來講，它太大了。我同時還發現，對於我一個涼州的作家和學者來講，還有一道牆也擋在我前面，這就叫“中原文明中心論”。

陶炳堦：這兩個“中心”如何對您產生阻隔感？

徐兆壽：當大禹分封九州和確立貢賦制度以後，中央之地就有了，而四面和八方也就有了。慢慢地，經過夏商二代之後，周公在洛陽建立成周城之後，中國這個概念產生了，四夷也同時產生。這時作為中國的文明與四夷的蠻荒就有了分別。再到司馬遷的《史記》鑄就之後，“中原文明中心論”就有了明確的歷史界定。兩千年來，中國人就是在這樣的文明觀和歷史觀下進行生活的。可是當我在梳理西部文學，在寫我家鄉河西走廊的時候，發現我的故鄉不在中原文明之內，且在漢武帝之前幾乎沒有歷史。這個對我影響很大。幾千年以來我們不在中原文明的版圖之內。漢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以後，我們才有歷史。

可是，在我讀《山海經》和《史記》《漢書》《後漢書》等這些漢時和之前的典籍時，都會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中華文明的一山一水之源，這就是昆侖山和黃河的源頭。在那些書裏面，昆侖山在今天新疆的於田南山，河源就是昆侖山的東北和西北。到司馬遷時，昆侖山和河源都不在漢地，而在西戎那里，這怎麼解釋？進一步講，《史記》中講“大禹起於西羌”，西羌又在哪里？即使不說西羌，大禹治水從積石山時總是確信的，但積石山也不在漢地。大禹的九州又指哪里？這些都是巨大的疑惑。還有，中國的神話都起源於昆侖山，連昆侖山在哪里都無法確定，又怎麼能確定華夏的版圖呢？那時，我就有一個朦朧的想法，西部一定藏著華夏文明的眾多秘密。但為了敘述故鄉，為了講清楚華夏文明的故事，就得把這兩個中心論打破。

陶炳堦：這些都是在上海得到的啟示嗎？

徐兆壽：過去就有，但很模糊，而到上海來以後，在每天回答人們關於何為西部何為絲綢之路何為涼州時，反而越來越清晰了。

我到復旦讀書時，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那個時候在讀《荷馬史詩》，還有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過去覺得後兩部作品非常棒，想在有生之年若能寫出那樣的作品也不枉一生，可是，在復旦再讀這些東西的時候，竟然慢慢地不喜歡它們了，反而覺得《荷馬史詩》很偉大，遠遠超過了它們。相比來講，《洛麗塔》就太花哨了，甚至有些墮落。《尤利西斯》介於中間，它屬於茫然之作，是人類失去信仰後的真實寫照。而《荷馬史詩》在這個時候就顯得非常明亮，它是寓言，很偉大。在人類進入茫茫無助的大海和曠野上時，可能它會指引人類走出迷霧。所以我就扔了前兩部作品，重讀《荷馬史詩》。

奇怪的是，在閱讀《荷馬史詩》時，就在想中國的史詩在哪里？我就下意識地轉頭向西北望去。那里有崑崙山，雖然我還不能確信，但我那時有個模糊的信念。我還看見了西來的佛教，看見鳩摩羅什、玄奘等人正走在古道上。一條西行之路向我慢慢敞開。那是人類文明交流的大通道。所以如果說我不去上海，不去站在那個現代性的大都市門前，去跟人辯論什麼叫中國、什麼叫西部，不去辯論什麼叫西方、什麼叫中國，不去辯論什麼是邊緣、什麼是中心，不去辯論什麼是人、什麼是動物，我覺得我不可能發生轉變。所以上海對我來說，我認為是脫胎換骨的一個地方，我永遠感謝上海和復旦。

**陶炳堦：**您是2010年去上海的，那時是不是正在舉辦世博會？

**徐兆壽：**對。那時上海可繁華了。很多人都從西方來，看到了上海的市容後說，上海的繁華已經超過紐約了，至少和紐約相媲美了。我沒去過紐約，也無法判斷，但也很高興。上海人很自豪的說，我們上海已經成為今天的國際大都市，而且首屈一指。我去過東京、去過首爾等等這些亞洲城市。我感覺上海確實比它要繁華，而且充滿了人情味。你到東京和首爾去的感受，就是被現代性壓抑著的兩個城市，感覺有一只無形的手在壓著他。但是上海充滿了蓬勃的力量，那就是充滿了無窮的想像，充滿了奮鬥，充滿了欲望的城市。那個現代性的手沒有壓住，相反，在拼命地召喚人們。所以當時我對上海的感覺非常好，我認為在國際化交流的層面上來講，上海比北京要走得更好，它更廣闊、更頻繁。但也正是在那里，我“看見”了另一條路，那就是絲綢之路。

**陶炳堦：**看來您是于更宏大的樣本之中瞥見了絲綢之路這條脈絡。這是您回到西部的契機嗎？

**徐兆壽：**我本來是想畢業後留在上海的，但我還是回來了。原因我說不清楚。能說清楚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當時的校長叫我回去，他說，上海灘上人才濟濟，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但大西北還是需要你的，你可以發揮才能。我回去就做了傳媒學院的院長，做了一些事。我的作用發揮了一些。另一個原因大概是我的老師陳思和先生說了一句話，他說西北啊，廣袤的原野、戈壁、大漠、高山、雪山，充滿了悲劇性精神，中國文學的希望就在西北，能出偉大的文學。他這句話對我來說充滿了暗示性，但是卻沒想到其實他無形之中把我推了一把，我本

來是留在上海的，可他這麼一說，我覺得我這一輩子什麼都可以不幹，就得寫一部自己認為還不錯的一部作品。那時候我就聽到了這樣一種召喚，我覺得我就必須回來。第三個原因我覺得我看到了這樣一條偉大的道路，有事可來做了。因為我當時講西方文化已經講了兩三年了，當然，中國文化已經講了五年了，兩種文化對比來講，就看到了絲綢之路。它遠比西方人描述的古猶太人走出來的那條宗教之路要偉大得多。它是陸地文明的偉大通道。

## 二、為中華文明辯護

陶炳堦：我看到老師您在文章中多次為絲綢之路辯護。

徐兆壽：是的。我最早講中國文化史，主要講孔子、老子和佛教的東西，再講一些其他的詩歌、音樂、美術等。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系統。西部就經常處於邊疆。很多問題被擱置，無人去講。比如《易經》的玄理部分，比如神話考古。我也講不了。還有一個也被擱置，即絲綢之路。也偶有涉獵，但常常一筆帶過。主要原因大概是其封閉性導致的。但講西方文化時就不一樣了。為什麼呢？在你講西方文化的時候，它源源不斷地就講一個歷史邏輯：人類是從非洲草原上產生的，最開始的文明是從西亞開始的，那里有 80 多個世界第一的考古存在，而主要是希伯來文明是從那里產生的。另一個文明的源頭則是古希臘文明，它產生於愛琴海，產生於克里特島那個地方。它們後來走到了一起，在古羅馬時代融為一體，使整個歐洲信仰了基督教。然後就有了後來我們所熟悉的西方文明史。

他們把猶太教順著那些河流來到尼羅河，來到了非洲、埃及，然後從埃及又開始到了希臘、羅馬等等這些地方，把這條路描繪成整個人類的大路，說成是世界性道路。什麼伯羅奔尼撒戰爭，特洛伊之戰等都被說成是人類最了不起的戰爭，而從不提發生在中國的那些偉大的戰爭與英雄。以前我很迷戀西方文化，可是當我打開地圖 1 看，那不就是那一小坨地方嘛，它怎麼能代表整個世界呢？他們怎麼能代表整個人類呢？歐亞大陸那麼廣闊的土地它就代表了西方的一小地方，亞洲在哪里？你找不著。你就很沮喪。

所以在我寫作的過程中間，我覺得有一些東西對我啟發很大。一個是雅思貝爾斯等大哲學家，當黑格爾批判東方哲學和批判孔子的時候，他的學生雅思貝爾斯卻大力提倡孔子，認為孔子是人性道德範式的創立者。我認為這個評價至少很中肯。你看哲學上開始重新看中國。在這個角度來講的時候，西方人並不瞭解中國，他就簡單地批評了你是吧？你說他愚昧不愚昧，當然愚昧。跟我們中國早期批判西方有什麼兩樣？他很盲目。第二個人就是斯塔夫裏阿諾斯，他的《全球通史》。我當時因為給學生要講世界史，就讓學生讀這部世界史。當你讀的時候他就告訴你一個清晰的歷史：西元 1500 年之前是陸地文明的時代，西元 1500 年之後是海洋文明的時代。他說的很清楚。如果說早期的陸地文明，那就是東方的大陸中國和西方的大陸羅馬，中

間都是山地，西亞有一些土地，是吧？恒河和印度那個地方有多少土地嗎？沒有，多是山地。所以你再看看 3000 年以來的歷史就是西方的羅馬和東方的中國兩個蹺蹺板在不停地撬動，然後中間有一些小國家不停地像峰巒一樣崛起。我當時看到這個很驚奇，我就說，那我們把西方的歷史，就那個蹺蹺板的那一頭寫得那麼輝煌偉大，中間的歷史他也不去寫，這一頭的蹺蹺板的地方他也不寫，那你西方能自圓其說嗎？你為什麼會有“十字軍”東征？你能說清楚嗎？你說不清楚。你那一系列的文化從哪里來的？你難道是自產的嗎？你又不能告訴我們是自產的，所以他就說這些東西都是兩河流域來的。兩河流域你能說得清楚嗎？也說不清楚。所以他不停地誇大兩河流域，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全世界文明代表第一的有七八十個。我記得最早的、最重要的就是彩陶，所以後來我到咱們大地灣發現比他還要早的彩陶，我就非常的難過。

**陶炳堦：**文明需要書寫，是一種話語權的爭奪。

**徐兆壽：**我們中國人沒有說這個事情，甚至沒人相信這個事情。你看今天有幾個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大聲地說過我們的彩陶是世界第一？沒有人說。這說明什麼呢？我們大多數人不敢去相信它，不敢去相信它主要是沒研究。沒研究也沒有人去說，傳播不夠，是吧！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個事情，不知道這個情況，所以他不能說嘛。另一個就是大地灣的彩陶被定義到了前仰韶文化中，這是個令人難過的事。所以，早期西方的文明史中，這個猶太教走過的這條路被形容成一條文明的大道，絲綢之路卻無人去講。但是斯塔夫里阿諾斯卻大書特書。他確定西元 1500 年之前是歐亞大陸交流的時代，這一下把我們的絲綢之路說清楚了。也就是在明代之前，你看跟我們的歷史就套到一起了，是吧。明代以前，整個世界就是歐亞大陸在交流。那我們絲綢之路為什麼沒人去講？甚至南方的學者還不承認有一條絲綢之路，這個很荒謬啊。

一直到 2016 年，我就看到另外一本書，英國牛津大學弗蘭科潘寫的《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他的背景是什麼呢？我一看他是從阿拉伯世界過去的，他跟我的起心動念是一樣的。他早期接受的都是阿拉伯的教育，我早期接觸的全是中國的教育，後期我們一下子到 1980 年代，轟轟烈烈的西方的東西來以後就接受了西方的文明觀。他更為直接，他到英國、德國等等這些地方去學習的時候，他就把他那一套放棄了。他跟我們一樣接受的全是歐洲人怎麼從兩河流域這兒吸取文明的營養，古希臘和希伯來文明如何結合，產生了新的羅馬，產生了基督教，基督教的革命又是怎樣完成新教運動的，“航海大發現”、資本主義崛起、美國的民主等等，都是這樣。

所以他這本書的序言我看了以後就很激動，為什麼呢？他和我一樣，小時候看到的世界的中心都是自身民族歷史中確立的，後來在世界史中都找不著了。世界的中心被簡單地移到了歐洲。我們當時所看見的漢唐時代面向西方的時候，有一個中心就叫涼州，就是我的家鄉。人們已經不相信它是中心了。今天的中心是敦煌，敦煌是最西邊的一個城市，也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中心？

陶炳堦：那涼州作為中心是如何確立的呢？

徐兆壽：我們可以看整個河西走廊的歷史，武威一直是中心，到了清代，康熙確定甘肅的治所在蘭州的時候，武威的地位才衰落下來。這個武威，在唐朝時設置河西節度使後才把涼州叫武威。相當於涼州雖變小了，但由其作為首府的古臧以及其所屬的武威郡將其名稱保留了下來。從此，涼州也就成了武威。但是，即使如此，河西也一直是一個統一政治體，涼州仍然為首府所在地。只有當它不再是河西或甘肅之首府時，它才從中心位置被剝離出來，也才四百年左右。在漫長的兩千多年中，它一直是河西的中心，且在漢唐時候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我的問題是，在漢武帝之前，在大禹的九州中，河西走廊也沒有被納入其中嗎？難道它在此之前一直是化外之地？那麼，雍州在哪里？漢代揚雄所講的雍州變涼州的事難道是子虛烏有？

司馬遷沒來過涼州，因為那時候河西還在西域。張騫鑿空西域後，河西四郡後設，河西走廊才從西域分離出來，於是西域就指河西走廊以西之地。後來我看到班彪、班超父子到這邊來建功立業，再後來酈道元也來過這裡，《水經注》裏明確寫到了。他們的著述裏，都特別重視兩個地方，一個是昆侖山，一個是黃河的源頭。過去張騫是第一個尋找它們的。如果還有的話，就是周穆王了。但周穆王的故事我們沒有太多能相信的材料，張騫的則在《史記》裏記得清清楚楚。

我一直講漢武帝和張騫完成了我們華夏文明歷史上第一個探源工程。你看我們今天把探源工程說得如此偉大，那我們想像在漢代的時候，它是不是也這樣偉大？肯定的。當時除了戰爭之外就是它。漢武帝確定於闐南山就是昆侖山。黃河的源頭就是《山海經》裏面講的昆侖山的東北部，有河流出，流到鹽澤。張騫寫的很清楚，然後那個地方，水潛行地下，在積石山這個地方奔湧而出，成為黃河。當我看到這些的時候，我就不停地往西走，所以越往西走的時候就越發現歷史上很多問題清晰起來了。原因是這些很少有人走過，或者考證過。知識份子來的太少了，所以沒有太多記述。

這就是我在2010年後發生的事情，我認為對我非常重要，它讓我重新認識世界，重新認識我的故鄉——西部。

### 三、幾個大的寫作轉向

陶炳堦：閱讀您以往的作品，文章種類很多，不同時代也有不同的主題和相應的作品，您能談談在您的寫作史上經歷了哪幾次轉向嗎？

徐兆壽：如果概括地講，我的寫作經歷了幾個階段變化。第一個階段是萌芽或者說初期吧，寫詩。大學時期，那時候詩歌是最紅火的，所以大家都在寫詩。每個人口袋裏，不論學數學的

還是學生物的，都背著一本詩集，所以做詩人就是最了不起的，所以我那時候做了一個詩人。後來看了托爾斯泰、羅曼·羅蘭的作品以後覺得，詩人不能夠展示或者說不能夠充分體現自己那麼宏闊的想法，就動了小說的這個念頭，就開始寫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寫過一兩篇，不過癮，就直接開始寫長篇小說了。所以從詩歌轉向小說，這是我覺得是 80 年代末一直到 90 年代末的這樣十年左右的一個歷程。

到了 2000 年前後我就不寫了，我覺得文學沒意思。文學本來是經營我們人生的，後來突然變成了名利的追求。這是其一，其二它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很虛無、很荒謬，或者說一直看這個世界不順眼、很悲觀的這麼一種地步。它使我與生活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我覺得我要放棄它，得實實地生活了，所以我就放棄了。因此到了 2002 年的時候我一直沒寫，2002 年元旦的時候，忽然之間，哎呀，大概有三四年沒寫了，非常難受。覺得如此空白的人生，天天做工作，不是我的人生，我此生不能幹這個事情，生命還有什麼意義，我總是這樣問自己。當時我拒絕了很多做行政工作和調到北京、杭州的機遇，我就想搞文學。所以當我愛人生下孩子以後到老家去，有幾個月我就一個人在家，每天無所事事，跟同事們除了打牌之外，在幹什麼呢？吹牛。再就是依然還是喜歡看書。看著看著就覺得，我為什麼非得看他們的東西？為什麼不能自己寫呢？這種想法很強烈，於是我就又開始寫，這就是《非常日記》。從《非常日記》一直到《幻愛》，這幾部小說，我覺得對我來講又是一次轉變。就是我對具體的這種青春期的生活和校園生活充滿了興趣。所以當時寫的都是一個主題：愛情、婚姻。我覺得可能跟年齡有關係，所以就寫了這麼多東西，另外那個時候我就瘋狂地在網路上開始寫博客等等之類的。這是一個轉向，從詩歌轉向小說。

做這些事情的同時我開始做教學，教學對我起了很大的作用。2005 年，我開始上《中國文化史》這門課，2008 年開始上《西方文化史》，其實是《世界文化史》。我經常開玩笑，這是文化的任督二脈，今天就是西方和東方嘛。如果東方屬陰，西方屬陽，如果東方屬陽，西方就屬陰。應當說東方是屬陽，西方是屬陰，從中國文化上是這樣。但是後來你會發現西方文化很強勢，東方文化反而是沒落了，像陰陽顛倒。在教學和研究中，這兩種文化的對比，對我後來的影響非常大。我有那麼幾年就放棄了寫作，我覺得我沒把這些東西搞清楚，我就在小說裏面大發議論、大談中國文化的走向，那不是荒謬嗎？所以我得先把這個事情搞清楚。所以我就不停地寫中國文化的各個問題。

所以對我來講，有那麼幾年我一直沉浸在中西文化的對比的這樣一種思想的場域中間，也很幸福。那個時候三十六七歲，覺得人生還很長，精力也很充沛。我覺得有幸能做這個事情，對我來講非常開心。可是我沒想過 2010 年當我到上海去以後，我的世界才真正被打開。所以人永遠沒法知道自已的命運是什麼？未來的路是什麼？怎樣展開？你根本不知道。

2010 年之後我就開始轉向做絲綢之路，這一條世界大通道的寫作與研究。這是我的第三次

轉向。第二次是向中國傳統文化轉向，到2012年《荒原問道》出版是一個階段。第三次轉向是《鳩摩羅什》的出版，是向人類文明的大方向轉向。

其實我剛開始只是有這樣一個想法，當我在2012年回到蘭州，回到西北師大以後，就覺得這是命定。可能一般人都看的是西北師大是不是“211”和“985”，我不會。我們上學的時候，西北師大是很好的學校，後來學校有了三六九等分之後，我依然覺得她很好。西北師大的“西北”兩個字在起內在作用。過去西北師大有一批重要學者在這裡執教，也產生了一批作家和詩人。他們是西北文化的守護者。我從復旦畢業到蘭州，也帶著這樣的一種內在使命。這不是誰發文件給的，而是一種自覺。我的師兄弟們有從西北去復旦讀書的，回來的幾乎沒有。他們有那樣的命運。我卻沒有。我覺得我從上海到西部，就好像是從中心來到邊緣，但同時，我又覺得這個邊緣有大不同，它連通著另一個西方，即歐亞大陸中的中亞、西亞和歐洲，乃至非洲。我仿佛看到了一些微光。

還有，我在復旦讀書時，聽過幾位名教授的課。復旦有幾個學者在否定絲綢之路，為什麼呢？我當時不理解，後來我就明白了。他們拿上海的視野和現在的肉眼在判斷西部和歷史地理。他們的這樣一種方法類似於一百多年前的那些疑古派們，也是用肉眼在判斷一個幾千年滄海桑田的西部世界，他們想當然地把黃河的源頭確定在了今天的青海，也認為昆侖山就是青海境內的某某山。他們看著新疆的沙漠和高山時，怎麼也無法相信過去這裡有廣闊無邊的水域。我想，這大概也是學者們的局限吧。我大概也一樣。讓我去判斷今天的上海，我就很盲目了，說出的話肯定是淺薄的。

新疆的一個詩人叫沈葦，他寫過一篇文章。他說他見過一個老漢，去了一趟北京，回來以後村上的人都問他，北京怎麼樣？他說北京特別繁華，就是太偏了。太偏了，他居然會有這種想法，說明什麼呢？他的中心不在北京，他的中心可能就是他們那個伊斯蘭世界裏面的某一個地方，或者說就在新疆的某一個中心。你會發現其實人跟人都是不一樣的，接收的資訊不一樣，對世界的認識也不一樣。我覺得西部需要走一遍，這也來自我另外一個判斷，就是說，我們的歷史學家大多數都是“本本主義”。有一些史學家是走過來的，我非常崇敬。司馬遷是用自己的身體丈量中國才寫中國。那個時候甘肅和其以西以北的地方還沒有被漢朝納入版圖，他沒來過。或者說西域世界他是靠想像來理解的，所以他對西域世界的寫作非常少。張騫怎麼說，他就怎麼寫。其他地方他都走過，孔子所在的地方他親自去瞻仰過，看見禮容還在，禮器還在，所以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這個地方他沒來過，所以昆侖山在哪里，他無法說。黃河的源頭在哪里，他也只是聽說在哪里，他忠實地寫作，但他不知道，他不能概括、不能判斷。我覺得司馬遷是值得尊敬的。寫《三國演義》的羅貫中，他那時候也是走遍那些地方，赤壁走過幾遍，他才能把那些東西能寫出來。所以古人是一遍一遍去看，甚至說去重新去構建，用自己的理想去構建。

陶炳堦：構建？老師，小說可以構建，那歷史是如何被構建的呢？

徐兆壽：歷史是什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歷史。聖人有聖人的歷史，知識份子有知識份子的歷史。你看西方的歷史，用理性構建了“西方文明中心主義”，我們不也有“中原文學中心論”嗎？

今天的歷史學家都強調自己手頭掌握的材料是真實可信的，但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講，沒有事實本身，只是你怎麼陳述。這也就指的是構建。你在用一種什麼觀念在講述，這個很重要。我前天看一個北大的歷史學者說，教科書上的內容大多不可信，可是，連教科書都不可信，那你說的就能信嗎？期間，作為嘉賓的馬未都問“司馬光砸缸”是真有這個事情嗎？這個歷史學家說的確有。然後馬未都又問是什麼砸的缸？說是石頭。馬未都又問，你確定是石頭嗎？你見過這個石頭嗎？你確定不是錘子砸的嗎？歷史學家就慌了手腳。你見過嗎？你沒見過。只有一個“司馬光砸缸”，五個字而已。可是馬未都又說了，當時北宋可能做不了這麼大的缸。你看這個事不就趨向於荒謬了嗎？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歷史可能只是一個事實的外殼，真實的歷史是需要去陳述的，要尋找它的內在邏輯，就像我們今天在做的事情，我現在在說，但我心裏還在想另外一些事情，誰能知道？誰也不知道。或者說，你在聽我講，但你又怎麼想？我不知道。其實我們永遠不能夠去真實地判斷，我們只能就一個事情來說，按邏輯來構建一個歷史，是我們當下所需要的。我們只能是這樣去講。這樣的邏輯對我們寫小說的人來說太容易了。我們每個人都在講自己的一生。我給我同學講的是一個充滿了搞笑的自己的前半生，當我跟我們家張老師講我童年的時候，充滿了讓她共情的事件，當我給我女兒講的時候，那又是另外一個充滿了仁義、充滿了道德、充滿了情趣、充滿了愛的童年。你看，我們有不同的想法，會有不同的陳述，這對我們作家來講太簡單了。所以一個人會在一生之中不斷地去描述自己的人生，到死都會有不同的想法。哪有真實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只有構建的歷史，沒有真實的歷史。你只有用理想或者用什麼之類的，用善意不斷構建起來的這樣一個歷史，只能說是被我們人類崇尚的、愛戴的、信賴的，我們願意去這樣效仿的歷史。可是我們現在構建的歷史都是空洞的虛無的充滿了陰謀論的，你看這就是我們不需要的歷史，對吧？我們現在處於正在被解構的歷史之中。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東西方構建起了這樣一套歷史，它依然值得我們去懷疑它。我開始懷疑“歐美中心主義”的這樣一套世界觀和文明觀，我也同樣懷疑我們從周公和司馬遷構建的這樣的“中原文明中心說”，這樣一套歷史觀和文明觀。因為什麼呢？他把我們四方的文明都遮蔽了，他把我們野蠻化了。事實上我們現在這100年來我們已經發現了比中原文明早的文明，西部有“大地灣文明”，南部有“良渚”，東部有山東的“大汶口”，北方有“紅山文化”，四方都有不同的文化，都早於5000年。那麼如果說仰韶文明最早從6500年前出發，你還是比四方的它們要晚1000多年。1000多年的歷史，為什麼沒人去講？所以我後期其實已經不是一

個簡單的文學者，我已經是個史學愛好者，一個考古學愛好者，我在跟你說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已經轉向這樣一個學術了。這大概跟我的教學也是息息相關，跟我的興趣息息相關，跟我對重新從上海回來要解讀西部有關。

#### 四、研究《易經》和中華文明觀

**陶炳堦：**老師，前面這個轉變可以用《西行悟道》來證明，可是您出版《補天：雍州正傳》時似乎又有變化。

**徐兆壽：**是的，這是第四個轉向，是轉向《易經》的研究。所有這些東西都融入過去的歷史中間，不是說此時才發生，而是早已經在你的人生中間鋪墊，只是到這個時候發生了重大的、或者明顯的變化而已。

我研究《易經》應該說很早很早。1990年代一畢業，我家裏就放著《易經》，但看不懂。我經常跟人說每一個漢字、每一句話都很熟悉，但是放到一起就不認識它了，就成天書了。這樣就翻來覆去地看，包括《金剛經》也是這樣，你不能理解“佛法非佛法”“佛非佛”。怎麼能這樣講呢？因為我們用的是一套西方的理論。

**陶炳堦：**跟我現在一樣，也看不懂。主要是什麼原因呢？

**徐兆壽：**它有一套方法論，我們現在不知道了。中國後來的儒家理論在阻擋它，因為儒家也不講方法論了，進入了一套形而上的理性的思考中了。後來便是西方的實證的科學理論擋在我們面前。凡事都要求實證，且已經越來越忽視我們的感性認識。知識系統不一樣。你比如說，這一百年來，我們幾乎不用五行、陰陽等概念了，就連表示時間的干支也不用了。而是用從西方引進的一整套知識。西方的這些科學理論和知識只能解釋物質理論層面的內容，即實證的一面，無法解釋來自心理的唯心理論和知識，所以對於中國古代的理論與知識體系來講，這只是事物的一部分，即我們的肉身活動的部分，而我們的心理活動則無法去講，同時，即使是肉身部分，中國文化也有一套解釋的理論，而這套理論簡單被否定後就無法言說了。

**陶炳堦：**西方的古典文化比較具象，或者說“實”，比如油畫和雕塑這些藝術形式。

**徐兆壽：**對，中國文化虛實結合，到宋之後就有些虛了。中國文化中，你的肉身是陽，而你的心理部分為陰，你看這就是你的全部。它一說就是全部，而現代西方文化的知識系統只有陽這部分。同時，你的身體也分陰陽，這就更難理解了。這樣講的時候，中國文化就顯得廣大無邊。

**陶炳堦：**您是因為什麼原因而研究中國文化的呢？

**徐兆壽：**2005年時我開始教《中國文化史》這門課，上了一半，學生就在底下問我，老師，你講《易經》的時候匆匆帶過，你到底懂不懂《易經》？我說怎麼不懂？他說，你會算卦嗎？

我說，不會，那一部分沒必要學習。學生再問下去，可是我卻問自己了，剩下的部分真的沒必要學習嗎？不懂就這麼簡單地否定了它？它在過去幾千年裏一直是中國人日常使用的東西，為什麼到了現當代我們就說它是迷信？到底是誰否定了它？所以，與人交流其實就是與自己交流。

《易經》由三個部分組成，象、數、理。象，你首先是不懂，你不會看。理你也不懂，但多少能意會。數是最不懂的，要推算，要搖卦推演。大概民間流傳最廣的是數算，義理部分主要由官方學者繼承，而觀象則不知何人能知了。所以這樣一個巨大的空白就放在你跟前了，《易經》叫“群經之首”，它為什麼是“群經之首”？回答不了。所以我認為一般人只能回答說，《易經》排在最前面，是因為很多人都說，某某某說他是“群經之首”，他並不能自己確認是“群經之首”，是不是這個道理？他只能說朱熹說是“群經之首”，你看孔子把它擺在“六經之首”，司馬遷、董仲舒把它擺在“五經之首”，或者說後世誰誰把他放在“十三經之首”，邵雍（邵康節）說它是“群經之首”，但是他自己無法確定它是“群經之首”，這之間的關聯他沒有。研究二十多年的研究，我現在就很清楚“群經之首”就是說世界上所有的邏輯、所有的方法都是《易經》給你的，世界上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理法制度等等都是《易經》給你的。現在我就明白它確定是“群經之首”。它是百經的“基礎”，它是“本源”，所以說“群經之首”的說法都有些不合適了。

陶炳堦：明白一些了。

徐兆壽：所以說，在我的文學世界中 2010 年是個分水嶺。我到復旦開始讀書，這個時候沒有教學工作了，反而給我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間，能認真地研究過去很多年的疑問了。比如，中國過去的行政機構為什麼是三部制，或六部制，或九部制，這什麼是三、六、九三個數字，回答不了。官員為什麼從周公 360 個官職？為什麼不能突破？為什麼不可以少？中國人對數如此的迷戀，你不知道。為什麼是五行？為什麼我們老家的房子那樣建？我 8 歲的時候，父親早早地帶著我到要建新房子的地方。來了一個人，我們那里叫道士，拿著羅盤等等之類的，拿了一根線，垂直下來，打了打方向，說這個地方就是上梁的地方，把梁先定下來，然後其他的房子都根據那個梁才開始做的。這個在我腦海中印象特別深，為什麼？我們現在感覺蓋房子就是哪個地方有空地，哪個地方能放桌子，我們大概一看，可以，就這樣建了。但老家不是這樣建的，它是有規定的。這規定是誰規定的？沒有人告訴你，人們還非得按照它來做，種種的一切，你所學到的這些東西它都有數有理有象，是一個無窮的世界，你根本不知道，而那個世界正控制著你。住的房子由它控制，你的名字是它控制的，你結婚時要看八字要看日子，是它控制的。有人給你算八字你就相信了，說你能過一輩子，你也被它控制。你到死的時候，哪一天死了，哪天要埋也被它控制。你會發現一個傳統，一個無所不在的手在控制你。而那個傳統，那個隱藏的傳統，民間的傳統，根本沒有人去回答。至少我的世界裏沒有人告訴過我。

陶炳堦：日用而不覺。

**徐兆壽：**對，也是《周易》中的話，百姓是日用而不覺。但問題是我覺了。這可能與我喜歡哲學有關，也可能因我是一個文學寫作者，我才能發現併發問。如果我是個純學者，也許就發現不了，為啥呢？純學者不大關心日常生活，即使關心也可能將其盲目地確定為迷信而不去正視它。可是作家就要關心日常生活，作家要寫，比如說某人五點鐘起床，他幾點鐘要幹啥，你得算清楚。他幹什麼、跟誰怎麼樣等等之類，你都得有邏輯關係。當你一個又一個邏輯關係擺著擺著，擺來擺去，你就要去想，你人生中間經歷的這一些邏輯關係是否有規律？這規律又是什麼？如果你懂《周易》，大概是不會有問題，如果不懂，可能就會胡編亂造。這就是司馬遷的天人之際。說人要說天，但天的事就是《周易》的事。你看，說到這裡，它竟然如此重要，但我們常人哪里懂這些。所以作家為什麼要寫細節就如此之難，就在這。此外，當你要寫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日常你回答不了。我們現在當代的作家寫作都是胡編亂造，或者根據自己的經驗，就這麼寫，寫完就完了。他不能夠真正地構建一個人的生活，為什麼呢？沒有方法，如果有方法就是“憑空”就是根據自己來造，以自己為方法，靠自己的想像、自己所經歷的一切來造。這個東西也是《易經》給你的世界。《周易》中講，大道你不能明白的時候，就要求諸己，觀自己，記得是要忠實地觀自己，也就是觀自在，你也就明白天道了。

**陶炳塬：**觀自在也可以這樣去理解啊。

**徐兆壽：**對。中國文化中的所有的東西都是這樣，所以當我後來用了很多年以後就發現中國所有的文化先歸到孔子，再後來是周公、文王，再後來歸到黃帝，而第一個出發的就是伏羲。你就得研究伏羲，所以我後來的這五六年都在研究伏羲。當年伏羲是怎樣做易的？《周易》告訴你，他也有方法，“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仰觀天象，俯察大地”，中觀人類和鳥獸魚群，做了八卦。八卦是幹什麼的？是算卦的嗎？據一份資料說，當年秦始皇要燒這部書的時候，李斯說這是一本算卦的書，秦始皇就沒燒，其實是治理國家的大法。那麼如何治理？聖人拿它治理天下，凡人拿它算命。至於怎樣治理天下？你就不知道，所以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我就不能去研究算命的東西，而要研究治理天下的規律。

**陶炳塬：**同樣的方法，對於不同人有不同的用處。

**徐兆壽：**對，對我來講，我就不能像民間的算命先生、風水先生那樣，去給人算日常生活中的婚喪嫁娶這樣的小事情，當然這樣的事情也很重要，你會在這樣的日常中能理解到易卦的奧妙，然後再去理解天下的治理，就更好了。但我不能去做，我只能去研究它，不能去給人算。我們有紀律要求。

**陶炳塬：**這個是不是有些矛盾？

**徐兆壽：**也沒什麼。作為當下的要求，我們必須去遵守，但作為學術研究，國家給我們開了口子，是可以做的。所以，對我來講，它就是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所以我給你們會講一些學術，但不會去算。說實在的，我也不是太會。

陶炳堦：明白了。那您將研究都聚焦在哪裏？

徐兆壽：所以我要研究的問題都是學術界和歷史上的大問題，如司馬遷所說的天人之際是什麼？孔子所講的經，為什麼是六經？是六個數字，他為什麼不是五經？到秦始皇時毀了《樂經》，或者是失去了，總之成了五經，所以禮樂不能相和，只剩下了禮教，就成了專制社會。如果說禮樂相和，專制就能被克制住。你看現在沒有和人心的東西了，所以從秦始皇開始就失去了“樂”。我後來把它稱為“絕學”，就是張載的“橫渠四句”裏面有一句話，前面其實都很好解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就是天地是有“道”的，“道”是有“心”的，也就是說天地也是有“善意”的，否則的話我們怎麼去理解這個世界。這就是類宗教的東西，“為生民立命”也好理解，就是給老百姓給一個方向，給他們請命等。那麼接下來有一句話就不好理解，“繼往聖之絕學”，什麼是“往聖”？“往聖”很少。張載以前，“亞聖”孟子，“聖人”孔子，再往前說，“文王”“周公”這就是“三聖”。再往前說如果真有聖人，那就是黃帝，最早的一個“聖人”就是伏羲。伏羲我們很少說是“聖人”，他是“三皇五帝”之一。當我們這樣去說的時候，你會發現“往聖”的“絕學”，就是從伏羲開創的易經八卦，到黃帝時候參照易經八卦進一步“制禮作樂”，然後有了治理身體的《黃帝內經》。然後再到文王、周公重新對易經八卦進行解釋，重新治理天下。到了孔子的時候，他從56歲以後開始攻《易經》，最後編纂成《周易》，他的絕學排在首位的是《周易》。如果今天沒有《周易》，我們中國人就沒有方法論了，為什麼？時間從哪里來？空間從哪里來？根本不知道。

當我研究了伏羲以後，當我從我們過去信賴的西方文明給我們的文明三要素出發去理解中國時，我發現它不能解讀中華文明。文明三要素是城市、鐵器、文字。那是海洋島嶼文明的要素，我們是陸地，農耕文明。不一樣，因此我就堅決地放棄了這樣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東西。中國的文明是從伏羲開始，確立了文明禮儀。禮儀確立後，才有道德。禮儀、道德產生，才有文明，很簡單。伏羲仰觀天象，俯察大地，中觀人類與鳥獸魚蟲的行為畫了八卦，是天地的法則。根據這個創立了家庭倫理，所以人們說他確立了婚姻，但人們往往不把這個東西當作一個重要的事情來對待。這是個大問題。

陶炳堦：為什麼這樣說呢？

徐兆壽：因為我們相信文明的三要素之後，我們對人類文明的確立就不再去關注道德和精神的方面，而是直接關注其外在的東西，如創造財富的工具、技術，如管理人類的城市、制度等，如記錄我們思想的文字等。這些都是形式。整個人類被西方文明的工具論等等這些東西給左右了，帶偏了。我們老覺得婚姻這東西就是人類自然創造的，將來也要消失，所以不重要，甚至認為它束縛了人類的自由，更是要將其打碎。當我們把西方的《聖經》拿來看的時候，你會看到亞當和夏娃也是看見對方身體的時候，用樹葉遮住自己的身體，才有了羞恥，有了智慧。這個智慧就是倫理，發現天地的秩序了，能夠產生生命了。因此文明的內在要素，東西方都一

樣，就是有了“兩性倫理”，有了道德的一剎那。

陶炳堦：這個理解有意思。

徐兆壽：在此之前都是“人不知其父”，都是動物。所以“人種”和“人”不一樣，你看，發現了如此重大的區別。人是從伏羲開始，過去都叫“人種”。伏羲氏不是創造“人種”的，而是創造人的“文明”的，而“人”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中國文化是最值得信賴的。

當我發現這個概念的時候，對西方文明的一系列的“文明論”，就覺得那些文明的要素是外在的，那是一個“物化的文明論”，所以有一天人類被機器人取代，也就被認為是正常的。而我們的文明才是人類真正要追求的東西，這是“大道”。也就是過去我們人吃得少，穿得不好的時候，人依然可以是很文明的。今天人穿得很好，吃也非常好，可是人是野獸，是野蠻，不文明。這個東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是吧？所以為什麼要研究這些東西？其實到後來你看，從西部就開始上升到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上升到對人類文明的新的理解。

陶炳堦：這個認知路徑很清晰。

徐兆壽：在研究伏羲文化的過程中，我又發現了一些東西。過去我們所有的論伏羲、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都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跟科學是對立的，我們不要科學，於是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就是對立的。我們不要西方文化，一說西方文化就批判。你看南懷瑾先生是這樣講的，曾仕強先生也是這樣講的，我們現在很多的中國學者也是這樣講的。可是我不這樣想，我覺得我能夠獲得這些東西，都是我42歲之前學習的那麼多關於西方文化得來的東西，沒有它我怎麼能知道這些東西？沒有它，我怎麼知道今天的日地關係如此的準確，是吧？我們的黃道這不就被西方科學證明了嗎？我研究了三年天文學以後發現，真的是西方的科學對我們大有用處。我們所說的西方的天文學就是我們所說的現代天文學，把我們的古代天文學可以實證，伏羲文化的星象系統不就還原出來了嗎？那我們的文明就是科學的，這就是關於時間、空間等存在的創立。

## 五、實證和重新解釋伏羲文化

陶炳堦：所以您說“伏羲一畫開天”就是在太空中間畫出了個時間圖。

徐兆壽：對。具體說就是太陽從東往西運行的一個時間圖，所以我們的十二地支就是從星象上畫出來了，這也是十二屬相，後來就有了十二個時針的鐘錶的發明。鐘錶是西方人發明的，可能是根據十二星座吧，但到我們這兒來是那樣準確。十天干是早期的十個月的曆法，十二地支是十二個月的曆法。因此當我確信這一點時，我對中國文化就更加充滿了發自內心的一種熱愛，一種自信。

如果用一個簡單的時間圖概括的話，西方的古希臘的文明產生於 2500 年左右，再往前推 3000 年左右，再往前推沒法推了，它的時間很準確。《荷馬史詩》就是西元前 800 年，也就是說 2800 年前的東西，那麼再往前推它就 3000 年多年前。這是根據希臘神話考古得出的結論。特洛伊城被考證出是 3600 年前修建的。這可能就是上限了。猶太教產生於 4300 年左右，跟大洪水的時間吻合。埃及文明至少是 5000 年，因為它有文字了，印度的印章文字 5000 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楔形文字 5000 年左右。中國的黃帝也是 5000 年，至少我們傳說中是這樣的。2500 年前左右是軸心時代，5000 年前後是文字產生的時期，我把它也確定為前一個軸心時代。

**陶炳塬：**這個視角也挺有意思的。

**徐兆壽：**其他文明後來都被宗教取代，看不到之前還有什麼樣的文明的記述，可是中國的文化記憶不一樣。黃帝之前還有伏羲，他是創立時間和空間的那個人，或者那個氏族。你這麼想的時候就不一樣了。你再去一看它就不得了，它不像其他地方都是傳說怎麼創造天地什麼之類的。伏羲不是創造天地，伏羲是對天地進行命名。之前就已經有人了，所以孔子講得很清楚，伏羲之前是“人不知其父”，伏羲開始以後有了文明，有了輩分，家庭就產生了，始祖就有了，所以文明就開始產生了。

所以我對伏羲文化的研究，其實不是簡單地研究天水的伏羲，而是研究我們整個人類文明是怎麼誕生的，天是誰創造的，地是誰創造的，人是誰創造的，時間是誰創造的，你會發現伏羲可能是第一個。在此之前，人類這個人種已經生活了兩三百萬年，是與動物一樣的存在，但伏羲以後就不一樣了，有了對人、天地、萬物的命名了。

**陶炳塬：**那您是如何來論證的呢？

**徐兆壽：**今天的考古發現已經很多了，如果我們把伏羲看成制禮作樂的時候產生的，那麼，我們就要用彩陶、玉石和河南賈湖中的骨笛等等這些材料來證明，時間至少是 8000 年前。也就是說，他在 8000 年前，其他文明都是 4500 年左右。或者說黃帝、埃及的法老這些產生於 5000 年前，那時已經有了時間、空間、人這些命名了。於是，終極的問題就出來了，這些是誰創造的？目前世界上沒有其他文獻記載的，只有《周易》裏頭記載了，“天一地二”就是伏羲創造的。河圖“天一生水”，所以你看對人類的這些古代文獻，我們沒有人去解讀。可是當我一研究的時候，就充滿了極大的興趣。

再往河西去一看，“天一生水”也很清楚。五行裏頭水在北方，“天一生水”，天在北方，“一”從北方開始，因為“一”就是對天的命名，而且是水的方位，就在北方。北方被命名為黑色，所以河西走廊那邊的山、水、城、土地、戈壁什麼的都被命名為黑色的。黑水、黑山、黑山湖，黑戈壁，黑水城，再往北方有黑龍江、黑土地。而且我們去看過的，黑戈壁確實是黑的，顏色都是黑的。所以那麼多人都在用文獻，用什麼蒙古語、匈奴語等等之類，他們根本不

知道的語言去考證，為什麼叫祁連山，為什麼叫黑山等等之類的。你就根本沒有我剛說的這樣一套邏輯如此清晰。

所以為什麼我說在河西這個地方發現了世界的秘密，就在這裡。進一步講，祁連山是乾山，為什麼，當我研究北宋的邵雍，因為先天八卦是從它開始的，後天八卦是把原來的伏羲八卦命名為後天八卦，他推出了個先天八卦，到現在人們就不知道這個事情了，人們都認為伏羲畫的是先天八卦，其實不是。當你把伏羲八卦還原成為邵康節所說的後天八卦的時候，你就發現時間和空間是一體的，乾位就是立冬的時候，所以祁連山就是乾山，昆侖山就是坤山。兌山是當金山。敦煌為什麼叫敦煌？我一直在想，敦煌那個地方都是黨河、當金山、阿爾金山，是不是？它為什麼是金？那里的河流為什麼叫黨泉河水、黨河？黨、當其實都是兌的變音。昆侖山為什麼叫昆侖山？為什麼叫昆？人們不知道，就是坤地女王，西王母就在那地方待著。為什麼西王母待著？是個女性在那地方待著，守護著河圖洛書這些東西？祁連山為什麼叫祁連山？在天祝這個“代乾山”，據說是藏語，漢藏語系最早是不分家的，雖然我也說不上它到底是什麼，但是你冥冥之中覺得有些東西它在。祁連山是不是“乾連山”？的變音？為什麼有“乾三連”的說法？它們合起來是不是就把乾卦的事情說清了？你再去考察那個地方的氣候變化，因為八卦的方位和氣候的節氣是一起的，時間和空間那時是不分家的。所以當我們這樣去研究的時候，祁連山就出來了。人們說天山就是祁連山，這話也對也不對，為什麼？天山確實天山，天山也叫北山，天為水，天一生水。你看天山就是中間的一畫，它的兩邊是兩個盆地，就是兩塊水地，這就是今天的水這麼寫的緣故，其實兩邊就是兩塊水地，卦也是這樣，中間一個實的，兩邊兩個虛的，這就叫北山，這就是坎山。

**陶炳堦：**這個您在《補天：雍州正傳》中寫到了，我看的時候很驚訝。

**徐兆壽：**是啊，當我們這樣去研究、去尋找、去講出來的時候，你會感到伏羲命名世界的方式就是根據象來確立的，是象形的。所以八卦就是象形的。其他的卦我就不講了。大體都是這樣的邏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其實伏羲他不是今天我們所講的華夏文明的共主，而是天下的共主，所以史書上講“伏羲王天下”。《史記 - 五帝本紀》中講堯的時候有一段文字，是對八卦創立的方法論的描述，是對伏羲、黃帝文明創造的記憶。可惜很多史學家都不研究易經，對它不在意。

所以，伏羲氏是在青藏高原上創立八卦的，有了時間、空間、夫妻倫理等這些文明的要素。黃帝呢？是在大洪水時代向東漂移的一個氏族，但他們繼承了伏羲的文化傳統。他們來到了黃土高原。到了周公時進一步向東移，移到了華北平原一帶了，洛陽就在華北平原的邊緣。從“天下”到“華夏”，再到中國，這是中國文化的三個階段。

今天中國已經沒有人敢相信伏羲是給整個人類創造時間和空間這件事了，因為我們大部分人已經接受了歐洲文明中心論和中原文明中心論了。可是，當我從科學的角度這麼去說它的時

候，我相信沒有幾個人能推翻我。先說北冰洋，是北方，是一這個數字命名的地方。它是水，是最冷的地方。然後到東面，是木，是三這個數字命名的地方。然後到南方，是火，是二這個數字命名的地方。再到西方，是金，是四個數字命名的地方。然後就產生了《河圖》《洛書》中的一些規律，再後來，世界萬事萬物的規律也就都被總結出來了。

**陶炳堦：**老師，我看你在書裏講了很多天文學的內容，也就是說伏羲的文化起初都是由星象來命名的嗎？

**徐兆壽：**是的。我一直在想，海德格爾看了老子的《道德經》後，就對時間和萬物的原初命名感興趣了，如果說他研究過伏羲文化，我估計他會對存在有非常全面的認識和解讀，與現在我們看到的內容完全會不一樣。

我說的就是星象學。其實西方也存在，但到海德格爾這時候，科學一詞已經成為他們反對宗教的利器，也是他們建立哲學的基礎，所以，對上古時代的科學就無法洞悉了。事實上，伏羲用的上古時的天文學就是那個時候的宏觀科學，只不過那時的天文學是來命名大地和萬物的，不單單是解釋自己的，反過來，地上的一切又是來命名天空的，天地和人以及萬物都渾然一體，天人合一。星象學是上古時代人類普遍在用的知識系統，如印度的星象學就很發達，埃及神廟裏全是星象學，古代兩河流域的星象學也很發達，反映在上古時的猶太人的書中。這些知識後來都被宗教取代了，只有中國還保留著它的本來面目。

所以“觀星授時”是全世界通用的方法論，非中國上古時的方法，這也就反過來說明伏羲文化的延續性。我們現在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將其重新解釋清晰，讓中國上古文化彰顯出其科學的一面。這當然只是一面，還有另一面，也是可以說清楚的。

**陶炳堦：**老師，您最近在寫什麼新的著作嗎？

**徐兆壽：**《開天·伏羲正義》，還是關於伏羲文化的一本書。我要把伏羲文化講到日常生活中去，比如說像生活中我們這個杯子為什麼是圓的，但是底下應該是方的，現在我們也把它做圓了，按照中國人的方法底下應該是方的。這就符合我們“天圓地方”的文化。圓代表的是時間，方代表的是空間。這當然是對中國文化的還原了。還有很多很多。我們可以把伏羲的這一套理論還原到我們日常生活中，重新對日常生活做一個新的解讀。還沒寫完。